

敦煌归义军入奏史研究琐言

杨宝玉

摘要: “9—11 世纪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作为归义军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如:大中五年曾有三个沙州使团先后到朝,张氏前期选派入奏使者时启用了张球等外乡人,张议潮入京为质后仍通过往来使团与沙州人士保持密切往来,金山国史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有待重新考量,曹氏归义军首次成功的入奏活动实现于同光二年,击败甘州回鹘后曹氏进行的几次入奏活动之间有极其紧密的内在联系,与西返的清泰元年入奏使团同行的还有前来为慕容归盈宣诏的后唐使臣,同光年间甘州回鹘的三次入贡系由相继掌权的三位可汗分别实施,归义军入奏成功与否与中原王朝政策及灵武节度使等辅助直接相关等等。

关键词: 敦煌; 归义军; 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08(2012)02-0060-06 收稿日期: 2011-11-23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0600000084)

作者简介: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00732

敦煌藏经洞开启后,凭借着重新面世的敦煌文书,学界已对晚唐五代宋初时的敦煌地方政权——归义军政权的历史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不过,学术研究难有尽头,归义军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挖掘。2006 年,笔者申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9—11 世纪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归义军入奏活动为中心”,随后即与同事吴丽娱先生合作,正式开始了对该课题的研究。我们首先对已公布的数万件敦煌汉文文书进行了重新排查遴选,然后据原卷图版仔细过录拟引用文书,并反复核校,细密注释,以求尽可能多地把握史料中的细节。同时我们也特别注意对不同文书的比对推考,努力揭示文书之间隐含的各种关系,并结合晚唐五代宋初中原王朝的历史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力图在纷繁变换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探寻历史的真相,解读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规律。这种不厌其烦如履薄冰式的工作方式使我们发现了不少被以往研究者忽略的看似细小,实则隐含着重要研究信息的宝贵线索,从而

使我们对下述若干问题形成了有别于前人的不同看法。

一、关于归义军政权 主要入奏活动的基本情况

作为一个偏处西陲的地方政权,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央关系,始终是一个主宰着归义军政权的政治路线和统治方略的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政权的兴衰,也影响着它统治下的敦煌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而入奏进奉乃是最能集中有效地反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政治活动,是可供了解分析相关历史真相的突破口。通过挖掘敦煌文书和传世史书中的有关记述,我们已梳理出十余次归义军政权重要入奏活动的基本情况。

比如,关于曹氏归义军首次成功的入奏活动,以前学界流行的说法是“曹仁贵没有因为贞明二年首次通梁失败而打消通梁之志,大约贞明三年或四年春夏再次通梁,结果成功。贞明四年秋(据 P. 2945 (1) 所款‘七月’而言)朝廷也派使臣

来抚沙州。”^①在认真校录注释该说所据 P. 2945 书状的过程中,我们对该说渐生疑问:如入奏成功且使臣西降,曹议金(仁贵)理应获得节度使任命,至少其自称的官职在贞明四年(918年)前后当发生变化,他在 P. 2945 书状中的署名更不应是“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所谓“使臣来抚沙州”之后一年左右的敦煌文书中的纪年题记也不应全部错乱。通过对张氏归义军最后一次入奏活动及其与曹氏归义军首次成功入奏活动之间关系的比对分析,可以得出后者完成于同光二年的结论。我们认为,围绕这次入奏,沙州与朔方、朔方与中原,甚至中原与沙州之间均曾有使者往还,表明三方对此事都相当重视,但中原使臣并未给曹议金带来旌节,他带来的乃是李存勖将要建国立朝、正在招诱番夷入贡的消息,归义军前往入奏是后唐“化远来夷”计划的一部分。同时,史籍中对曹氏归义军此次朝贡得朔方节度使韩洙“保荐”的记载值得重视,这既可说明灵武为促成归义军入奏做出了巨大贡献,又与曹氏是接续金山国的地方政权有关,因为金山国曾在形式上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但彼时的后梁又为后唐所灭,其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韩洙“保荐”遂成了多赢的解决方案^②。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在敦煌文书中找到了该次入奏时归义军所上表文的抄件,即 S. 4276 所存《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通过分析表文中记载的史事背景,及表文行文格式和相关词语等,以此可了解上表时间及相关史事背景,由安怀恩牵头上表乃相当高明得体的通变之策,便于解释归义军首领易姓问题。该表文进一步证实了曹议金不曾获得后梁册封,而修撰此表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他请节^③。

再如,关于清泰元年(934年)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入奏活动,学界一直认为该使团中的重要成员包括梁幸德与张保山,其中梁幸德在随团回至张掖时被甘州回鹘杀害身亡。通过对张保山与梁幸德生平事迹的考察,我们首先论证了该使团的正使为梁幸德,比他年龄大资格老的张保山不会随行。之后我们对 P. 3718《梁幸德邈真赞》、P. 2992v 所抄三通书状等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该

次事件的实际情况是回鹘因贪图沙州使团携带的财物等原因扣留了使人,但并未杀害梁幸德,梁的直接死因是在被甘州回鹘羁扣期间染患疾病,因为其邈真赞中“遂恋苏武而授敌,不顾陵公之生降,守节亡躯”及“倏加湊疾,掩世(奄逝)俄然”等语即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梁幸德被拘囚后的作为与境遇。与甘、沙、瓜三州使团一同西行的还有前来宣诏的后唐使臣,但他却被回鹘滞留于甘州。其时恰逢曹议金病重,归义军处理此事的速度和力度均受限制。待曹议金去世后,曹元德急忙修撰 P. 2992v 第一通书状以争取天使西来,其愿望极其迫切,因为后唐使臣宣诏的对象是瓜州刺史慕容归盈,为归义军属下,曹元德本就该为其主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曹元德需要借助中原使臣的力量为刚刚接掌归义军的自己请节。但是,此时他的实力和声望都不足以解决此事,此前不久承袭仁裕汗位的新可汗对归义军的态度更加强硬,故曹元德只得给曾与曹议金打过交道的回鹘众宰相修状,希望借他们之力说服新可汗。但曹元德恐怕未能如愿,此事的最终结局很可能是在回鹘裹挟下,后唐使臣随回鹘新的大规模入贡使团自甘州折而东返^④。

二、关于某些重要 入奏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据现有史料,延续了将近二百年的归义军政权实施的入奏举措难以尽数。在对具体入奏活动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相继发生的入奏事件之间常常具有内在联系,有时甚至可用前因后果来形容,因而我们有意识地梳理了某些重要入奏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比如,关于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夺得政权后的遣使入奏,我们考出张议潮先后派出了多个使团,以致大中五年时共有三个沙州使团到朝,规格越来越高,收获也越来越大。具体说来,首先到达的是大中二年(848年)起义成功后即被派出的高进达使团,为十人左右的一队而非一些学者主张的十队,使者原来的身份仅为部校。因当时河西

①见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1991年。

②详见杨宝玉、吴丽娱《P. 2945 书状与曹氏归义军政权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③详见杨宝玉、吴丽娱《S. 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索隐》,《出土文献研究》,即刊。

④详见杨宝玉《清泰元年曹氏归义军入奏活动考索》,待刊。

东部地区尚受吐蕃控制,使者们只能将表文秘藏于挺中,故使团规格非常低,严格说来当是一小队化装密报,其任务只在于向唐廷报告瓜沙已被张议潮收复并请求内附的消息。这批使者历尽千难万险长年跋涉,最终在天德军护送下到朝,奏表可能也是通过天德军上达的,是以传世史书记载的主要是天德军奏报^①。第二个到朝的则是悟真率领的主要使者为僧人的使团,他们自敦煌出发的时间远远晚于前述高进达使团,但其时河西陇右等地多已收复,故行进速度、使团规格等都高于前者。他们到长安后所做贡献可用“宗教使者,文化外交”来概括,为再后的张议潭使团做了良好铺垫^②。在三个使团中,张议潭所部到朝最晚,但规格最高,收获也最大,直接促成了归义军的建立,并为张议潮请得节度使旌节。

再如,关于曹氏归义军击败甘州回鹘后的几次入奏,我们认为其间的关联非常紧密,而这正可以揭示甘、沙关系演进变化的原因与过程。同光三年战胜回鹘后,曹议金所派入奏使团的正使为张保山,并认为之所以派他前往,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张保山早在张氏归义军时期即曾奉命入贡,对中原情况比较熟悉;二是在与甘州回鹘的战争中,张保山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而该次入奏是沙瓜甘三州使团同行,由这样的文武全才任正使有利于震慑甘州使团中的前可汗的亲信。据传世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分析出,与归义军一般是“附回鹘以来”的情况相反,该次入奏甘沙关系发生了逆转,这当然首先是刚刚结束的甘沙战争结果的反映,也与曹议金用人得当有关^③。只是该次入奏归途回鹘使团内讧,前可汗狄银的亲信安千箱被杀,此事虽与沙州使团正副使均无关系,但沙州随员张员进却因与回鹘副使是朋友而受牵连。一年后甘州又一新可汗上台,追查安千箱被杀事件,张员进遂被回鹘诱骗拘扣。在当时甘沙政治关系的新形势下,此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以致曹议金在震怒之下不惜冒“断绝万年之道

路”^④的风险,欲采取强硬措施与回鹘对抗。曾同派使者的瓜州刺史慕容归盈遂撰就 P. 3016v 书状劝说曹议金,并与甘州斡旋,最终使张员进免于杀身之祸并继续在归义军政权中任职,以后还获升迁^⑤。但是,安千箱——张员进事件仍是甘沙交恶的导火索,直接影响即是在此后长达四、五年的时间内归义军都不能东向入奏,直到长兴元年曹议金不得不亲赴甘州交涉,才得以再次遣使入奏并获加官^⑥。只是短短几年后,入贡归来的梁幸德使团又被回鹘打劫,前来瓜沙宣诏的中原使臣更被回鹘滞留于甘州,新遭父丧的曹元德无奈之下只得修撰 P. 2992v 所存第一通书状向回鹘众宰相求助。但最终中原使臣恐怕还是在回鹘新的入贡使团的裹胁下折而东返了^⑦。归义军虽也有人随同护送,但仓促之间准备不足,规格极低,难有建树,在甘州陈福海都督率领的庞大使团对比下显得黯淡无光,在传世史书中仅留下淡淡一笔记录。而当他们西返至甘州时,前来接应的文端等人的交涉仍不顺利,遂撰写了 P. 3197v 书状向曹元德汇报情况^⑧。此后甘沙进一步交恶,归义军与中原又断了联系,直到曹元深时期才借助于阆朝贡及宣诏天使途经沙州之机再通中原。

总之,通过对前后相关的 P. 3016v、P. 2992v、P. 3718、P. 3564、P. 3197v 等敦煌文书的综合考察,我们基本理清了从同光四年,到长兴元年,再到清泰元年、清泰二年等四、五次归义军入奏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前因后果。

三、关于与归义军入奏史密切相关的一些敦煌地区史问题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入奏自然会与归义军政权运行过程中的诸多政治因素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因而,围绕入奏活动,我们探知了归义军政治史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关于张议潮赴京为质的背景、启程前作为、到京城后对归义军事务的关切,甚至企图遥控

① 详见杨宝玉《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

② 详见杨宝玉、吴丽娱《悟真于大中五年的奉使入奏及其对长安佛寺的巡礼》,《吐鲁番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详见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见 P. 3016v《天成二至三年(927—928年)慕容归盈致曹议金状》。

⑤ 详见杨宝玉、吴丽娱《P. 3016v〈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

⑥ 详见杨宝玉、吴丽娱《P. 2992v 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

⑦ 详见前揭杨宝玉《清泰元年曹氏归义军入奏活动考察》。

⑧ 详见吴丽娱、杨宝玉《P. 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的做法 我们据 P. 3804 愿文等考出当咸通七年春夏之际张议潭逝于长安后 唐廷曾频繁催促张议潮亲身入质 使他只得在当年八月仓促举办以庆祝寺院落成(实未竣工)为名的佛教法会。这是张议潮在沙州主办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佛事活动 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既向敦煌民众传递了张氏政权发生权力交接的讯息 又显示了张议潮的威望与影响^①。据 P. 3281v 书状 张议潮入质后 又派马通达等接其家眷入京。据 P. 3730v、S. 6405v 张议潮对陪质京城的年龄尚幼的两个儿子刻意培养 让他们并通过他们与沙州僧俗两界保持经常性往来 而留在敦煌本地的张议潮的旧属亲知也在继续向故主表示效忠 这一切直接导致了日后张淮深统治的不稳定。张议潮去世后其家眷仍留居京城多年 是以唐廷没再要求沙州送去新的政治人质。我们推测 渐渐长大的张议潮之子在京城不会毫无作为 对沙州政局非但不会不关心 甚至还应有所期待 张淮深屡求旌节而不获恐怕与他们不无关系。据 S. 2589 当唐末中原离乱后 张议潮二子于中和四年(884年)左右踏上西归之路 虽然一路并不顺利 但还是得到了邠州节度使等的帮助 并最终回到了敦煌 至少淮鼎成功西归 此后议潮系与张淮深一系政治势力难免争执 终于造成了大顺元年张淮深全家被杀。但是 取代张淮深的并非 S. 2589 所记年龄较长的淮谔郎君 而是较为年轻的张淮鼎 其中原因尚待探讨。我们大胆推测 张淮谔有可能死于淮深之前 或许与两派势力的争斗有关^②。

再如 透过对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的分析研究 我们揭出了归义军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关于张球的出生地与早期经历 根据 S. 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实为张球诵读该经及经咒的灵验记) 我们考出张球本为越州山阴人 成年后周游各地 至晚于咸通元年时已到北方 曾在灵州抄写受持佛经咒语并遇灵异 随后便因为官任职而留居河西。同样是根据 S. 2059 我们了解到张议潮收复凉州后不久 曾派张球率领大队人马押运唐廷拨付给归义军的出境粮以援助凉州守军 这表明最初唐

廷对归义军收复凉州的行动是支持的 那时两者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 并非像某些学者主张的那样从一开始唐廷即在与张议潮争夺凉州。S. 2059 还揭出张球曾多次被归义军政权派往京城入奏 并得到过唐帝敕封 因而他乃是归义军众多入朝使者中今可确知的唯一一位外乡人 这完全可以说明归义军首领对本地外交人才的匮乏有清醒认识并采取了极其积极有效的解决方式。通过对十余件张球作品中作者署名情况的排比分析 可解析出张球在归义军政权中曾颇受重用 自张淮深掌权后尤其活跃 为张淮深亲信 以致迁升至位高权重的枢要之职节度判官掌书记。在索勋掌权时期 张球亦为索勋幕僚 并曾修撰《索勋纪德碑》为使主歌功颂德。通过对无纪年张球作品撰写时间的梳理 特别是索勋时期张球作品的剖析 可推考出索勋曾周旋于张淮深与张淮鼎之间 并曾有过起用淮深旧属之举 而张球等淮深故吏也随其时变幻莫测危机四伏的归义军政局而升降沉浮。关于 P. 2913v《张淮深墓志铭》的撰写 我们推测也是在索勋时期 与当时调和各政治集团之间关系的政治需要有关。至于张淮鼎、李氏和张承奉当政时期张球的处境 可认为他相当受冷落 这位阅尽人世沧桑人海沉浮的耄耋老人最终是在课徒奉佛中寻求归宿的。总之 由于张球遍历张议潮、张淮深、张淮鼎、索勋、李氏、张承奉统治时期 并亲身参与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亲眼目睹了掌权者姻亲眷属之间的悲喜离合恩仇荣辱 可谓对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大事小情了然于心 故其遗文的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归义军政治史中一些重要信息 为我们追寻当时的某些重大事件 尤其是各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提供了宝贵线索。另外 我们猜想无署名敦煌文书中应当还保留有张球的其他作品(例如著名的 S. 6161 + S. 3329 + S. 11564 + S. 6973 + P. 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就很有可能是出自张球之手) 若能予以正确甄别 必然有益于我们认识文书的时代背景和史料价值 因而关于其人其事

^① 详见杨宝玉、吴丽娱《P. 3804 咸通七年愿文与张议潮入京前夕的庆寺法会》,原刊《南京师大学报》2007 年第 4 期,后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宗教》2007 年第 6 期。

^② 详见杨宝玉、吴丽娱《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载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或许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又如,关于张、曹两氏归义军之间出现的金山国问题,我们注意到 P. 3518v《张保山邈真赞》记赞主赴京入奏归来后“荐兹劳绩,当金(迁)左马步都虞侯(候)。一从注(驻)辖,五载有余”,然后即逢“谯公秉节”,从而得出了后梁开平二至三年(908—909年)张承奉曾派出过朝贡使团并成功朝梁的结论^②。该使团肩负有打探中原情况,以为张承奉制定政治决策提供任务,使团带回来的中原已无力西顾的消息最终促成了金山国的成立。通过分析当时的中原与西北地区形势、敦煌文书中保存的相关年代题记情况,及《皇极经世书》中的有关记载,可认为金山国的成立时间当为909年,与沙州正面临抗击日益强大的甘州回鹘而自己政权与之不对等的压力有关^③。关于金山国成立之后的史事,通过对 P. 3633 等文书的分析,我们考出金山国的最初辖境并非以往人们认定的瓜沙二州,因为据《龙泉神剑歌》,该次甘沙交战时,金山国与西侵回鹘首战于肃州,说明其时肃州尚为金山国辖地,立国时张承奉还是多少有些实力的。关于《龙泉神剑歌》所记战事,我们的观点是:连年征战已使金山国国力疲软,战线遂被迅速向西推进,直至沙州城下。在金山国君臣拼命抵抗下,金山国终获小胜,并准备反击,是以《龙泉神剑歌》的作者张文彻于诗中献计献策,调兵遣将,反复以豪言壮语鼓舞金山国士气,并进言张承奉完善建国措施。根据对 P. 3633 所抄各文献内容,特别是《龙泉神剑歌》与《上回鹘天可汗状》所记战事进程等分析,可认为两文所记并非同一战事,而是相差几近一年,诗歌当写于910年的那场战事之后而非911年,其时金山国刚在肃州之战中惨败,却在沙州之战中小胜,故此金山国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只是该次战争已使金山国元气大伤,失去了肃州等地,待次年狄银率领回鹘铁骑再次西侵时,即直接进逼敦煌,金山国战败投降,此即《上回鹘天可汗状》所记。从 P. 3633 各文献的抄写情况看,可认为各文献的书写时间首尾相差亦几近一年,其中《龙泉神剑歌》最早,

为草稿,写作时作者比较从容,故可以反复修改,而诗末所书被学界习称为《七言诗三首》的8行3段实际上是《龙泉神剑歌》的补写诗句,当补入相应位置。我们认为该诗完成后,作者又为族人张安左撰写了邈真赞,但无论从年龄还是经历上看,《张安左邈真赞》的赞主与《龙泉神剑歌》中的张舍人都非同一人。至于《上回鹘天可汗状》则是作者留副的抄件,是以抄写得远比前两件文献整齐^④。

四、关于与归义军入奏史密切相关的回鹘史和五代时中原政治史中的一些问题

归义军与中原政权的往来是伴随着与沿途及周边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而进行的,同时入奏的频率次数及成功与否也与中原王朝的政策措施密切相关,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也曾论及回鹘史和五代时中原政治史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关于占据着曹氏归义军入奏必经之地——甘州的回鹘政权,我们探讨了同光年间甘州回鹘所进行的三次朝贡活动,推考出这三次朝贡系分别由前后相继的三个可汗实施,从而可以比较清晰地认知此一阶段的甘州回鹘可汗世系及其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具体说来,同光元年至二年首次入贡后唐时在位的可汗是仁美,此次入贡系受后唐使臣及灵武节度使韩洙招诱而成行, P. 3931 即保存了韩洙专为此事写给仁美的书状,同时,该卷还抄存了甘州回鹘本次入贡所上表本。据传世史书所记,入贡使团于同光二年四月到朝,后唐册仁美为英义可汗,据 P. 3931,册封大礼也是在灵武节度使帮助下完成的。但是,稍后不久仁美即去世,其弟狄银接替可汗之位,他很快致书灵武节度使并第二次入贡后唐。P. 3931 抄存的韩洙给狄银的回书透露出狄银素有实力,但承袭汗位时亦有内忧外患,韩洙对此了然于心并一再激励其“丹心向阙”。通过认真比对,我们在 P. 3931 中也辨别出了狄银所上表本的抄件。至于朝贡的过程,据传世史书及 P. 3016v 书状可知该

① 详见杨宝玉《张氏归义军入朝使张球事迹及相关归义军史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暨民族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兰州,2011年8月。

② 详见前揭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

③ 详见杨宝玉《金山国成立时间再议》,《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杨宝玉《P. 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题记的史料价值》,《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 详见杨宝玉《敦煌文书 P. 3633 校注与相关金山国史探究》,待刊。

使团由安千箱(不同史料中又或写作“安千箱”“安千想”“安千”)任正使,于同光二年十一月到朝,但似未能使狄银获册封。之后即发生了归义军攻打甘州回鹘的战争,战胜的曹议金扶植自己的女婿阿咄欲上台,后者又在归义军带领下实施了甘州回鹘对后唐的第三次入贡。据P.3931,阿咄欲仅在使团路经灵武时向韩洙送礼致意,表明回鹘此次入贡相当被动,从韩洙给他的回书看,灵武对阿咄欲的窘境十分清楚。我们在P.3931中也找到了阿咄欲所上表本,虽则上表者于遣词造句中极力标榜自己的正统性,但其时甘沙关系的新格局已不可能使其受到后唐对待仁美般的册封^①。根据传世史书中的记载,此次入贡回鹘使团的正使为程郡明。据P.3016v,或许是因熟悉中原情况,更为展示甘州内部的稳定性,在回鹘上次入贡时担任正使的安千箱随行,但朝贡之后,安千箱却于归途被同伴杀害,表明回鹘内部矛盾重重^②。

再如,通过分析梁唐之际归义军政权入贡活动的不同结局与影响、后梁的建朝及关中形势、后唐的复国政策与外交努力、关内世袭藩镇的归顺及其共同立场等等,我们以归义军朝贡史事为突破口,对比论证了后梁、后唐治国方略的异同。相对而言,后梁比较局促乏力,经营与关注的重点仅在中东部地区。而李存勖则有统驭万邦之志,器局比朱梁大得多,在化远来夷方面,后唐初建时曾遣使招诱各地藩镇与周边少数部族政权,面向西北地区的使臣首先到达灵武,一向负有代表中原王朝押领西部政权之责的灵武积极响应,佐助后唐招诱甘州回鹘与沙州归义军等^③。除对后梁、后唐进行比较研究外,我们又从明宗对庄宗政策的继承、明宗朝对关内诸镇的治理、明宗朝的蕃夷入贡、明宗朝及稍后的归义军朝贡及其对西域入贡的辅助、明宗时期甘州回鹘频繁入贡及此后绝贡原因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后唐明宗时代的统治

策略与国家政局,揭示了归义军入贡成功与否,涉及归义军自身发展状况、与周边政权关系、兼有押领之责的灵武节度使的策略、中原王朝治国方略等诸多方面因素,因而对归义军入贡史的研究,也可为相关学者提供研究素材^④。

在曾经活跃于晚唐五代宋初历史舞台上的众多藩镇中,现今仍能通过诸多鲜活史料了解其真实面貌的主要就是敦煌归义军政权。相关研究可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当时藩镇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问题,解析藩镇政权内部的运作机制,把握不同环境下中央朝廷君臣和地方藩镇首领心态的变化,进而正确评价中原王朝为维护中央集权所采取的策略措施。我们一直以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入探究为努力方向,期望能够尽己所能将研究工作做细做深,并试图通过将文献考证与理论探索结合、不同学科研究者良好合作的研究方式,尽力规避某些单一研究可能导致的偏颇。

我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也还存在着一定问题。其一,由于归义军各次入贡活动的目的、意义、在敦煌地区史上发挥的作用,及现存相关史料的多寡详略、学界研究深浅程度各不相同,我们研究探讨的侧重点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相应调整。为尊重前贤研究成果,我们仅针对前人尚未论及,或虽有论述,我们存有不同意见或发现了新问题的归义军入贡活动及其反映的地方与中央关系进行探讨,亦由于受现存史料所限,最终研究成果尚无法覆盖归义军所有入贡活动。其二,侧重记载中原历史的传统史书对偏处西陲的敦煌地方政权的记载十分简略,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又大多残缺不全,杂乱无序。故此,我们的论述本就容易因受史料的限制而详略不一,加之时间有限,我们在资料发掘和理论探索方面都没能做到全面而无遗漏。其三,限于我们的学识能力,某些推理判断或有未当甚至谬误,尚有待相关学者评判指正。

(责任编辑:赵仁康)

①详见杨宝玉、吴丽娱《跨越河西与五代中原世界的梯航——敦煌文书P.3931校注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6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杨宝玉、吴丽娱《同光年间甘州回鹘的可汗更替与入贡中原》,《庆贺饶宗颐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刊。

②详见前揭杨宝玉、吴丽娱《P.3016v〈乙致令公状〉考释》。

③详见杨宝玉、吴丽娱《梁唐之际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归义军入贡活动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吴丽娱、杨宝玉《五代梁唐治国方略之比较——以梁唐之际沙州归义军朝贡活动为例》,《国学学刊》2010年第3期。

④详见吴丽娱、杨宝玉《后唐明宗时代的国家政局与归义军及甘州回鹘的入贡中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